

重庆巫山县 为退捕渔民发放慰问品



近日,重庆巫山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奔赴大溪乡,走访了解退捕上岸后渔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为他们送去了食用油、电饭锅等慰问品,表达了对退捕渔民的关怀之情。图为9月2日,重庆市巫山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为退捕渔民发放慰问品。

王忠虎 摄

(上接第一版)

在离东至沟村不远的边麻沟村,祖祖辈辈“靠天吃饭”,过惯了穷日子的村民心底里一直都埋藏着一个想法。村党支部书记李培东说,只在种地这条路上走下去,村里人怕是没有什么出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土地不能丢,但大家要努力换个活法。

终于,精准扶贫的春风吹进了窝沟,唤醒了这里沉睡已久的一草一木。“偏远”的确很远,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凭着天然的生态优势,这里迈出了乡村旅游的步子。

2016年,边麻沟村“花海”景区正式开张迎客,仿佛一夜间,这里成了很多青海人旅游打卡的乡村景点。让边麻沟人没想到的是,当年景区游客数量超过30万人次,景点门票收入突破100万元,带动村里其他收入400多万元。李培东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我们捧上了生态的“金饭碗”。

边麻沟村火了,东至沟村也火了。每到夏天,游客想要人住东至沟村的小木屋,必须提前预订。赵文科说:“村里旅游越来越红火,我承包的旅游餐厅生意也越来越好,每天的收入有2000多元,比以前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还多。”

走好“改革路” 发展添活力

黄南州泽库县拉格日村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纯牧业村。曾经长期在传统生产方式下,随着牧业人口增多,过度放牧带来的人草矛盾日益突出,呈现出“草原退化-牲畜无草可食-牧民无法养畜”的状况。2010年底,全村人均收入仅有2500元。

改变困境,唯有彻底转变发展方式——从索取转向保护,走草畜平衡的路子。2011年,拉格日村在时任二社社长俄多的带领下成立了合作社,推行以草定畜、牛羊组群、划区轮牧,让草场得到最大程度的休养生息。

回想当时的状况,俄多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成立合作社并用这样的方式放牧,很多人都不理解,现在大家都从中受益了,不仅草原的生态越来越好,而且收入也越来越高。

后来,俄多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拉格日村发展的步伐更快了。俄多深知,村子要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变,生产、经营方式要变,牧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要变。2017年启动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拉格日村的发展迈上了新台阶。2019年底,拉格日村合作社分红57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5万元,是2010年底的6倍。

拉格日村的变化只是青海省广大农村牧区深入改革的一个缩影。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例,从农村到牧区,一条“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路子愈发宽阔,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农牧民收入节节攀升。青海已有120多万户农牧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如今,西宁市城东区韵家口镇中庄村的500多户村民,告别小平房,搬进大楼房,户户都有小汽车,年年还能拿到村集体的分红。对于现在的生活,村民刘兴帮很满足,他告诉记者:“我和老伴儿每月能领到村里1300元的养老金,年底还有4200元的分红。以前羡慕城里人的生活,现在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打好“产业牌” 增收可持续

盘绣是中国土族刺绣中最主要的绣法,也是土族妇女一生的必修课。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姚马村,胡兰索卡的名字家喻户晓。胡兰索卡不仅有着着一手精湛的盘绣技艺,她还把盘绣做成了产业,并带领村里的妇女一起脱贫致富。

胡兰索卡家的院子被布置成了简易工坊。七八个土族绣娘围坐在桌子旁,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吟唱土族民歌,绣出缤纷图案,唱出幸福生活。

胡兰索卡告诉记者,土族人祖祖辈辈都只是把盘绣当作一门传承的手艺,直到村里的一位老人麻宝琴把自己的绣品出售后,她才恍然大悟,要是能把这个市场打开,对村里的妇女来说,或许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为此,胡兰索卡开始与县文化馆对接,在寻求帮助的同时,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2017年,胡兰索卡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正式创办互助县索兰卡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她说:“‘索兰卡’的意思是‘彩虹’,希望盘绣产业发展能像彩虹一样,绚丽多姿。”如今,胡兰索卡的公司已经吸收了本村及周边村140多位绣娘,2019年纯利润达到17万元。

在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的盘绣园中,大到挂画、茶席、背包,小到口罩、领带、茶杯垫、小挂件等,形形色色的盘绣产品应有尽有。目前,盘绣园带动农户145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3户,绣娘145人,其中骨干绣娘50人。2017年8月正式开园以来,每位绣娘平均在家门口就能收入2800元左右。绣娘们说,从山上搬下来,不仅住上了新房,还有稳定的收入,这日子真不错。

像这样的盘绣工坊,在互助县还有许多。他们大多采用了相同的运营模式,即“公司+基地+农户”。互助县盘绣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哈承清告诉记者,目前与公司合作的基地有22个,有效带动群众1100多人。仅班彦一个村,2017年6月至今,盘绣收入达到213万元。

如今,土族盘绣、藏绣等青海特色刺绣又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青绣”,成为青海广大农牧区妇女弘扬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手艺人。

专家共话长江大保护

全面布局、齐抓共管,扎实推进长江流域禁捕

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海洋大学教授 唐议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6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长江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的保护修复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流域禁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保护长江母亲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根据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目前,长江禁捕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也是攻坚克难、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7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禁捕工作作出了整体部署,正式吹响了冲锋号角。

长江流域禁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对于“开局之年”而言,今年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环节是:一要退得出,确保十多万艘渔船、二十万渔民平稳顺利退出;二要管得住,确保非法捕捞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这两项工作都不仅是渔业主管部门能够靠一己之力完成的任务。

在实现退捕方面,不仅要掌握退捕渔民生产、生活、家庭、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全面、详细、精准信息,还需要渔业、财政、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发展改革等多部门的协同合作。在打击非法捕捞方面,则更为复杂,由于非法捕捞行为涉及事前、事中、事后的一整条产业链,不仅仅需要在水上捕捞的这一个环节进行打击,还需要在渔获物运输、水产品销售市场、

非法捕捞器具供应、船舶控制以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结合等多方面入手,方能奏效,仅靠一个部门、一个方面则徒劳无功。这就必须由渔业主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多部门通力合作。为此,长江流域禁捕作为长江大保护的重要举措,要依靠多方“共抓”才能实现。

也正因为此,《通知》在强调提高政治站位的同时,着力构建了纵向上下联动、层层落实的责任体制,横向多方联手、紧密合作的协同机制。

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网络化、立体式“共抓”格局已经形成

一是在总体工作责任安排上。建立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基本工作体制,从中央到市县各层分工明确。在地方层面上,进一步要求各有关省、市、县三级政府均成立由主要

负责人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逐级建立工作专班,从而形成了地方各层级由政府主要负责人统一领导的工作格局。在国家层面上,明确了由农业农村部牵头总抓,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各司其责、密切配合的多部门协作机制,既指导、监督地方工作,也为地方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提供了工作样板。

二是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工作上。要求沿江各省(直辖市)成立由公安机关、农业农村(渔政)部门牵头,发展改革、交通运输、水利、市场监管、网信、林草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联合指挥部,建立了牵头部门明确、合作部门广泛的省级指挥体系,并强调了两个主要关键着力点: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聚焦水产品交易市场、餐饮场所等市场主体,严厉打击收购、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渔获物等行为,斩断非法地下产业链。

行业观察

《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报告(2020)》发布

□□ 本报记者 韩超

9月3日,全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高峰论坛在四川省隆昌市举行。论坛上,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联合发布了《中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记者获悉,2019年,我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种养面积接近3500万亩,稻谷产量达到1750万吨,水产品产量超过290万吨。

据了解,《报告》涵盖了2019年我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规模、发展特点、政策扶持、产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及发展建议四方面内容,为从业者和社会各界全面了解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全貌提供重要参考。

《报告》显示,2019年,各地稻渔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程度不断加深。稻渔综合种养在水产品保供和水产养殖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种养模式上,2019年,稻-小龙虾等7种主要种养模式占全国稻渔综合种养总面积和水产品总

产量的98.61%、98.57%。仅稻虾模式的种养面积、水产品产量就分别占全国稻渔综合种养总量的47.70%和60.84%。

据介绍,2019年我国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继续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稳粮增效作用进一步凸显,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品牌建设不断推进,规模化、区域化、产业化协调发展,产业扶贫效果显著,产业链进一步延伸,稻米和水产品加工业以及餐饮、旅游业快速发展,产业功能不断拓展,“稻渔+文化”“稻渔+旅游”等业态亮点纷呈,稻渔综合养种的融合发展水平和产业整体带动能力不断提升。总体看,2019年,国家和各地对稻渔综合种养产业仍然是以鼓励发展为主,同时,规范发展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主基调。《报告》预计,中长期稻渔综合种养面积将持续稳定增加。

与此同时,《报告》建议,应根据当前我国稻渔综合种养发展形势和要求,在科学制定产业规划和政策,构建和完善产业标准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引领,推动产业协调、融合发展四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和问题,保障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安徽农垦华阳河农场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6.2万亩。为调优种养结构,推进稻渔种养提质增效,今年,该农场以特色水产养殖为抓手,建立水稻与加州鲈鱼、澳洲龙虾、南美白对虾养殖示范基地80亩,预计亩均收益6000元以上,通过特色养殖带动职工增收致富。图为农场职工在养殖示范基地投放加州鲈鱼苗。

李龙 摄

技术模式成熟 产业链齐全——

辽宁稻渔总规模达到100万亩

□□ 本报记者 韩超

近日,记者从全国稻渔综合种养发展提升现场会上获悉,2020年,辽宁省稻渔综合种养新增15.6万亩,总规模达到100万亩,稻渔综合种养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为农民增收、渔业增效和农村富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20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将稻渔综合种养列入“菜篮子”工程建设,提出全省新增稻渔综合种养面积15万亩的目标。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辽宁省加快推进稻渔综合种养发展指导意见》,明确了发展目标,细化了任务分解,制定了具体措施,为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同时,辽宁各地的政策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强。

“2020年,辽宁省财政从中央财政拨付稻谷补贴资金1560万元,用于支持全省新增稻渔综合种养补贴。盘锦市连续多年在政

策和资金上大力支持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沈阳市列支财政专项资金对小龙虾、河蟹苗种和田间工程进行补助,成为稻渔综合种养发展最快的内陆地区。”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宋耀华介绍说。

“十三五”期间,辽宁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8000多万元,为稻渔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为推动稻渔综合种养持续健康发展,辽宁还持续创新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模式。一是创新苗种生产方式,以“光合1号”新品种为引领,年产生态蟹苗8万公斤,成为东北、西北和部分南方省份优质生态蟹苗供应基地。二是优化完善技术模式,稻田扣蟹养殖亩产值达到1200元,亩均增效600元,占全省稻渔规模32%;稻田成蟹养殖亩产值1000元,亩均增效500元,占全省稻渔规模47%;扣蟹、成蟹混养模式比单一养殖扣蟹亩效益增加300元左右,成为辽宁稻渔产业效益的新增长点。三是拓展多

品种养殖,从单一稻田养扣蟹,向稻田养殖扣蟹、成蟹、泥鳅、虾、鱼等多品种养殖发展,养殖小龙虾从无到有,达到4000亩养殖规模。

此外,辽宁不断加强科技研发和示范引领:一是不断开展科技研发。组织省内科研单位和龙头企业,通过科技研发,不断推进和完善稻渔技术体系,先后制定省级以及市级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标准;二是项目带动示范推广。积极创建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4个,在全省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省、市、县水产技术推广机构,联合开展稻田养殖成蟹、泥鳅、中华小长臂虾以及河蟹套养等技术示范,实现亩均综合效益较单一种植水稻提高30%以上;三是开展技术培训交流。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技术资料、电视讲座、信息发布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会,并组织到四川、宁夏、江苏、黑龙江等地调研考察,互相借鉴提高;四是稻渔评比促进发展。积极组织参加全国稻渔评比活动,

通过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开展“蟹王争霸赛”和“优质稻米评比”等活动,打造辽宁稻渔品牌。

如今,融合发展正成为辽宁稻渔全产业链的努力方向。通过培育融合发展综合体,注重稻渔综合种养龙头企业的扶持和培育,集中打造集蟹苗繁育、稻渔养殖、水产品加工、休闲旅游、餐饮服务 and 科技研发为一体的稻渔综合种养主体;通过打造交易市场的综合体,盘锦市形成了胡家河蟹老市场、宏进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和胡家河蟹北市场三位一体的全国最大河蟹交易市场,被誉为“天下第一河蟹市场”,年成交河蟹量达10万吨,年交易额近70亿元;通过拓展河蟹外向发展,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每年向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河蟹3500吨,创汇2500万美元。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辽宁已初步形成了技术模式成熟、产业链齐全的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宋耀华表示。

湖南长沙市

退捕转产办法多 渔民上岸不愁

□□ 本报记者 张振中

“无人机出动巡查!”

9月3日,在湖南长沙市望城区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上游锚地趸船上,由长沙公安民警、渔政执法人员等组成的综合执法队登上执法船出发,还新增无人机巡航、视频实时巡查等巡查方式,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今年以来,长沙市统筹各方力量扎实推进渔民退捕、社会保障、转业安置和禁捕监管工作。截至9月4日,退捕任务已全部完成。

为推进禁捕工作,长沙市不断强化联合执法监管。“我们在之前‘车巡、人巡、艇巡’的基础上,专门新增了无人机巡航方式。”长沙市公安局打击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办负责人介绍,在江河水域及沿岸,无人机巡航可视范围广,机动灵活,可在节省人力的效果下保证巡查效果。除出动公安无人机以外,长沙公安还对接长沙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接下来将出动更多无人机参与巡查。

截至8月底,今年以来长沙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开

展打击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共开展执法检查2315次,部门联合执法行动159次,检查渔具、水产品销售点等重点场所230个,水上陆上巡查32650公里,行政立案120起,移送涉渔刑事案件21起,通过加大执法力度,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401艘、非法捕捞渔具(丝网、地笼等)4920件约17.5万米。

渔民退捕上岸,就业是重点。经过精准识别,长沙涉及退捕渔民179户267人。为了确保渔民上岸后“能致富、奔小康”,一方面,长沙确保渔民生计保障落实到位,加快中央一次性补助和

过渡期补助资金拨付,发放渔渔船网设施证件回收拆解及奖励补偿资金1093.2万元,落实2020年捕捞渔民过渡期生活补助资金223.6万元;另一方面,妥善安排退捕渔民就业,如长沙县制定《2020年退捕渔民就业培训和和社会保障工作方案》,举办“点亮万家灯火”就业帮扶系列活动之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及退捕渔民专场招聘会,帮助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解决就业,浏阳市开展两场专场招聘会,实现退捕渔民转产就业90人;引导渔民投资80余万元组建湘卫河道保洁公司,直接带动渔民就业50余人。